

娱宾酒与乐岁诗

林小森

2016年的年尾,我在英国读研,学校放圣诞新年假的时候下了薄薄的一场雪,整个校园一夜之间都笼罩着霍格沃茨一样的氛围,是一种冷冷的灰青色调,仿佛随时会有猫头鹰前来送信。假期之后就是紧锣密鼓的大考,因此,我们这帮中国来的学生都不打算中途回国。英国同学纷纷被父母接走后,校园冷寂,学生食堂里,连做沙拉的生菜都眼瞧着枯了边不新鲜,一应氛围,都在提醒我:我是一个孤独的游子了。

放假后的第五天,我意外收到班上那位“阿姨同学”的邀请,她约请我和另外两位女同学去她家吃火锅、过新年。她笑着说:“你们自己带着床单和被套,我只提供枕芯和被胎,如果你们有羽绒睡袋,也带着,估计有人会睡在客厅长沙发上。从这里开到威尔士我的家,要四五个小时,路上咱们得在服务区吃饭,就AA了。你们可同意?”

稍微带着一点诧异,我们都点头。这位“阿姨同学”52岁,年纪比我妈还大,她40岁时与英国丈夫完婚,从宝岛台湾来到英国生活,继续当国际航班的空姐。51岁时,因为对会议口译感兴趣,下决心从航空公司辞职出来,再读一个硕士学位。她在课间与我们聊天,说起未来的梦想是帮助中国企业拿下英国的订单,“尤其是我父亲的老家浙江。”如此不走寻常路的女性,愿意照顾一辈同学的过节情绪,已令我很感动,所以,我们都没有在意她很多“泾渭分明”的要求。

迎着风雪,年纪已经是阿姨的女同学开着自己的SUV,带着我们北上,车窗外的景致越来越接近艾米莉·勃朗特在《呼啸山庄》中的描绘,那是阴冷的、风雪弥漫的,又是神秘的,带着呼之欲出的故事感。下午,从一条落叶缤纷的路驶入,我们竟发现“阿姨同学”与邻居挨在一起的家,是一座百年古建筑,相当于现在的联排别墅,她的家中有壁炉,有小小的旋转楼梯,到处放着景德镇产的茶具与笔洗。为了接待我们,“阿姨同学”的丈夫与10岁的女

儿特意去中国超市购买了丰富的火锅食材,包括珍贵的百叶、鸭血和豌豆叶。他们洗切了好几个小时,还亲自用花生酱、蒜泥、麻油与醋,调制了蘸料。而且,“阿姨同学”的女儿为了欢迎我们,特意换上了红色夹棉旗袍,梳起了中式发髻。可爱的孩子还能说一口相当流利的中文,她的开场白是:“你喜欢吃涮羊肉吗?我妈妈说,既能吃涮羊肉,又能吃乳酪和炸鱼块,将来才能走遍全世界。”

吃完火锅,我们与主人一家围炉夜谈,聊起彼此的家人、学业与梦想。自来熟的小女孩拿出一本大开本的速写本,骄傲地向我们展示——这是她家自制的绘本,全世界只有这一本。我吃惊地发现,这本由小女孩的母亲手绘的书,名字叫《北京的春节》,到我们去的那一天,才画到腊月二十三祭灶、拜灶王爷,还有北京娃儿抢吃灶糖的游戏。很明显,即将面临的春节故事还没有画完。“阿姨同学”解释说,绘本是根据老舍先生1951年的一篇同名散文改编的,文字都是老舍先生的原话。为什么她要在繁忙的学业之余,买了水粉颜料,亲自来画这本书?“因为孩子喜爱中国文化,我又远来异国,同时邀请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苏州大学、河海大学等单位的学者教授叶舟、杨旭辉、纪玲妹、沈建钢等作嘉宾访谈。这些史学专家,对常州春秋以来3000年的历史文化进行全面回顾后一致认为,常州的城市性格可用16个字来概括:仁义诚信、崇崇尚学、血性担当和经世致用。也就是说,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观点,常州的人文特质里,既有儒风,又存血性;既崇信仰,又具担当。常州人有着典型的吴侬软语、灵动应变的江南气质,也有着‘江南人’不太具有的憨直刚正。刚正血性,常州人是‘不太江南’的江南人,即所谓‘南人北相’。”

这一天,我们在“阿姨同学”家守岁,在零零散散的清雪中放烟花迎接新年,在“嗖嗖”的烟花绽放声中,传来在英国长大的小女孩欣喜的、忽然领悟一般的吟诵声:“天上风云庆会时,庙谟争遣草茅知。邻墙旋打娱宾酒,稚子齐歌乐岁诗……”

这是我第一次在异国迎接元旦,我记得,烟花落尽的时候,明亮的火星已经消散在夜空。“阿姨同学”与我们牵手行走在雪野上,我们一起吟诵:“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枝,晚风何处听楼笛,吹到东溟月上升……”是的,在那一刻,我们从未有这么清晰地意识到,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基因决定了,无论我们在哪里,都会以中国人的方式迎接新年。

村口的水杉

蒋保林

故乡的村口耸立着一排高大的水杉,我童年的时候它们就生长在那里了。而今,五十年过去,它们依旧挺立在村口。

水杉一年四季都是美的化身。春末时,水杉开始冒出嫩芽,青色的叶芽覆满树身,远望之,水杉就像笼上一层绿色的烟雾;夏日,水杉青青,阳光从树顶流泻下来,绿色也在流淌,直至流进了我的心田;入秋,水杉泛黄,几阵秋风,几场秋雨,几个秋阳,水杉就金黄一片,有几株则满树通红,摇一树黄金,燃一树火焰,将秋天的故乡彻底照亮;隆冬,繁华落尽,水杉举着一树萧疏的枝干,任由风霜雨雪扑打,鸟儿栖息喧闹。

那排水杉不知是何人所种。半个世纪岁月更迭,山村的水塘变成了良田,良田变成了虾塘,瓦房变作了楼房,旱地切换为运动场,唯一没有变化的是那排水杉,似乎人们已将它们遗忘,遗忘在悠远的时间长河。

那排水杉位于村口高岗上,地理位置绝佳,站在水杉树下,山下的景色尽收眼底,连绵的稻田,远处的集镇,天边的山峦,一望无际。那些年,我经常在这里眺望远方,想象着自己未来的岁月。

水杉树下有条土路,沿着稻田,曲曲折折伸向山下,那是村民出村上街的必经之路。换种说法,就是每天清晨,水杉目睹着乡亲出门;每个黄昏,又张开怀抱,欢迎游子归来。

我对那排水杉有着特殊的感情,我家的自留地就在水杉下面。夏日里,常随父母去地里播种、施肥、除草、浇水。劳作之余,我便举目看这排高大的水杉,看它映着蔚

蓝的天空,轻轻摇晃着枝叶,而满树苍翠的绿叶就像一个绿色的深潭,牢牢地吸附着我的目光。我不知道,这水杉有什么魔力,让人久看不厌,也许是它笔直俏丽的外形,是它特立独行的风骨。那时年少的我并不想这些深奥的问题,只任由一树苍翠盈满我的双眼。

记得有一个夏夜,雷电交加。早上,伙伴告诉我,昨晚的雷电打着了村口的树,我一惊,真不是水杉被雷电打着了。跑向村口,一看,原来雷电打在了一棵歪脖子柳树上,柳树浑身漆黑,浑如焦炭。而旁边的水杉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我不觉暗自庆幸。

年少时,我曾经日复一日地从水杉下走过。初中时,朝阳初升的时候,迎着朝阳,沐着朝霞,走向集镇上的校园;傍晚时,当水杉后面村庄炊烟袅袅时,才匆匆回家。不知水杉是否还记得当初那个青葱少年的青春脚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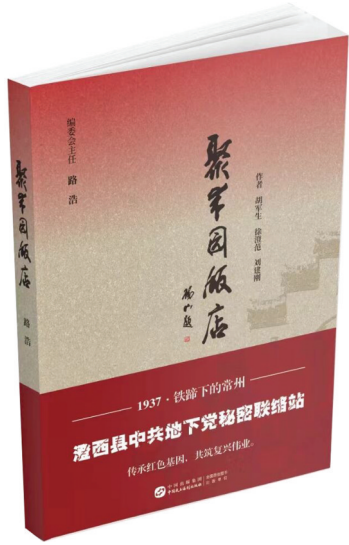
水杉见证了我年少求学的时光,也目睹了我离乡远行的情景。十五岁那年,我到常州求学,因为年龄尚小,母亲不放心,便让父亲送我到校。母亲把我送到村口的水杉树下,才依依惜别。现在,我记得水杉树下,母亲举目送别的情景,盛夏的风凌乱了母亲的头发,水杉树也哗哗作响,犹如临别的絮语!

三十多年了,虽然我很多次回到故乡,但很少作长时间的停留。现在,偶尔想起故乡,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那排青青的水杉,它笔直地耸立在村口,摇曳着满树青翠的枝叶,轻歌曼舞,仿佛在时时召唤着我的归来。

序与跋

吴侬软语中的血性风骨

李亚雄



2022年11月17日,全国地方志工作的领导机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在常州主办了一场全国性学术活动“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延陵风骨与争先精神”江苏分论坛。论坛的主题是历史上常州的人文特质与城市精神。论坛邀请了史学大家、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熊月之作主旨报告,同时邀请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苏州大学、河海大学等单位的学者教授叶舟、杨旭辉、纪玲妹、沈建钢等作嘉宾访谈。这些史学专家,对常州春秋以来3000年的历史文化进行全面回顾后一致认为,常州的城市性格可用16个字来概括:仁义诚信、崇崇尚学、血性担当和经世致用。也就是说,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观点,常州的人文特质里,既有儒风,又存血性;既崇信仰,又具担当。常州人有着典型的吴侬软语、灵动应变的江南气质,也有着“江南人”不太具有的憨直刚正。刚正血性,常州人是“不太江南”的江南人,即所谓“南人北相”。

为什么会是这样?学者认为,常州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常州文化长期受北方中原文化影响。常州濒临长江,位于江南多个城市的最北方,几次北方人口南迁都对常州文化产生了重要和直接的影响。常州处在南北两种文化交叉影响的边缘地带,南北两种复合性格在常州人身上显得更为突出。即北方人的“硬朗”在常州人的血脉里,已经融合成为常州特有的气质和传统。另外,江南

文化本身也具有尚武的文化基因,江南文化的基础是先秦时期的吴越文化,尚武好斗的“南蛮”特质依然根植于常州人的血统之中。

其实,除地理、地域因素和特质外,常州人不同于苏杭等典型江南城市的柔绵气质或者从根本上说常州人的血性风骨,更应该来自常州人的深厚的义理教育和守大节、怀大义的人文传统,来自千百年来常州人骨子里饱含的强烈的道义追求、大义担当和家国情怀,常州的文人学子、士绅百姓自古以来都普遍有着高尚的气节、正直的品性和强烈的社会责任。

汉代常州人彭修,曾三次重义轻死,为救太守忠烈捐躯,成为“郡内烈义第一人”;宋代常州人邹浩,曾三谏“立刘后事”,得罪皇帝被削去官职,被称为“忠鲠绝迹”的一代直臣;明代常州人唐荆川,因不迎合权臣而被“永不叙用”;清代常州人洪亮吉,忧心国事,上疏直谏,直指群臣,隐批皇帝,被誉为“常州文士最敢直谏者之一”。更有宋元之际,常州军民两万人誓死抵抗元军二十多万精锐大军,且坚守达半年之久,被称为“纸城铁人”。及至近代,常州更有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李公朴等一大批红色英杰,他们个个都用生命捍卫真理,用赤诚坚守信仰。东林党领袖人物高攀龙早在明代就曾这样评价常州人:“天下有事,则毗陵人必有”,也就是说,胸怀天下的常州人,但凡在关系前途命运和家国危亡的大事大局、大是大非中,都会毫无惧色地展现出一个时代担当者的抗争精神与血性风骨。

在常州三千多年的风云历史中,最沉重和屈辱的劫难应该是1937—1945年间关系民族危亡的日军侵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对华战争是企图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14年抗战和8年全民民族抗战,是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殊死大搏斗。

在这场劫难中,常州是1937年后全民民族抗战时期最早沦陷的地区之一。日军侵占常州,不仅在城乡进行了大面积持续的狂轰滥炸,而且像疯狂的野兽,对和平居民滥施法西斯野蛮暴行。在日军铁蹄的蹂躏下,常州人民备受煎熬,遭到空前浩劫。但在国破家亡、沦于敌手的日子,常州人

民誓死不屈,奋起御侮抗暴,掀起了持续不断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新四军挺进苏南后,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发展和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创敌后抗战的全新局面。常州地区军民胜利地坚持敌后抗战的历史,是波澜壮阔的苏南敌后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7—1945年,在那艰苦险恶、暗无天日的八年中,日本侵略军穷兵黩武、极端凶残,伪军等反动势力为虎作倀、无恶不作,常州人民处于频繁“扫荡”、残酷“清乡”、多重压迫、朝不保夕的水深火热和白色恐怖之中。但不屈的常州人民依然挺起胸、昂起头,以生命的代价,采取一切手段和方式与敌人进行殊死斗争。

特别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自觉建立起武装队伍,毫无畏惧地投身到抗日游击斗争中,发挥了全民抗战的主动作用。而且,随着形势发展和需要,他们又义无反顾地根据党的安排,危险地打入日伪内部,开展地下工作,在特殊战线通过特殊形式进行特殊斗争,隐蔽、巧妙、灵活、机智地为党工作,与敌斗争。他们经历了血雨腥风,经历了狱中磨难,经历了险境危局,经历了狱中磨难,经历了生死考验,他们用铮铮铁骨和一腔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有时还不为人知的英雄赞歌。他们用“生死”证明和体现了常州人血脉中奔涌不息的“刚烈风骨”和“血性担当”,本书所记述的就是当年那一批常州血性儿女的英雄群像和历史记忆。

从我从事党史工作的经历和经验看,我知道,写好这样一本书并不容易。这本书被定位“红色纪实性文学作品”,这就要求,作品必须始终坚持红色主线、红色基调、红色叙事。然而它又是一部纪实作品,这就要求,它必须以“实为纪、纪而实之”,确保作品具有基本和详实的史料作支撑,保证选用史料的准确性、真实性,必须基于真实可靠的基本史料来还原历史的基本面貌。当然,它同时又是一部文学性作品,文学的特性和要求,又应该具备相应的情节和细节,需要叙事的贯通与作品的生动可读。特别是本书以抗战为主题,以党的地下工作为主线,写作中还必须对当时复杂的斗争情形和历史背景做明确、准确的判断与辨析。

好在本书定位为“基于资料史实”的纪实性文学作品,在体裁运用和文字处理上有一定的弹性空间,亦好在地方党史部门在2004年曾组织出版过本书相关当事人的回忆资料,常州市党史工委也曾组织写过《常州武进地区革命斗争史》等地方党史著作,有这些可靠的党史资料和明确的史论观点,一定会给写作者以有力的思想和史学支撑。

这本书的策划者王荣泰先生,是一位从常州走出去的、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报刊出版人。1985年由他创办的《中国剪报》和2005年再度出手创办的《特别文摘》都是百万份发行量的全国知名报刊。他的新闻敏感和主流文化的引领意识与担当,促使他对红色历史的用心关注,特别是他作为本书主要记述人物之一的革命者的后代,从小耳闻父辈们的革命事迹,有着深入骨子的红色情结,他对父辈们革命品质和献身精神的敬仰,一直保留在内心深处,成为毕生心愿。

这本书的写作者胡军生、徐澄范都是中国作协会员。徐澄范还是喝着运河水长大的家乡人,他最知道家乡运河流淌着的家的味道,他知道运河孕育的不仅是交通发达、商贸繁荣,还蕴含着深沉的人文基因和常州底蕴,他对常州有着根一般的感情、火一般的热情。而作为千百年来常州文人群体中的一员,他们也最能理解和体悟常州人血脉中同时流淌着的儒风与血性,知晓它们融合演化的原因和方式。而且主要写作者都是“60后”,作为火红年代出生、红色信仰教育的一代文化人,他们有着对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的特殊使命与责任担当,特别是他们与父辈、子女同行,在跨越百年的历史进程中,用心见证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沧桑与巨变,作为时代的见证者、思考者和记录者,他们有更深远的思想、更广阔的视野,以及独到的观察和认知心路,他们今天以缓缓的叙事节奏,以及沉重的笔调和生动的文字,以一种责任担当,为过去、为当下、为未来记述了这段不能也不该忘记的历史和人物。

我一直在想,这本书写作的意义在哪里?

我想,它不仅仅是为常州留下一段丰富而详实的抗战记忆,为父辈们树起一座劫难年代共同的精神丰碑,其实,它也在为常州人千百年来形成、锻造和赓续的“血性风骨”留存一段特殊的时代印记和群像注解。是序。



东坡居士 (国画) 陈洪大

那时花开

赵鹏

多,连我在内一共才6位。集中授课期间大家都住学校招待所,中午和晚上多一起就餐,周末回常、周一回校时也常相伴同车而行,彼此之间由开始的相敬如宾逐渐变得不拘礼。记得当年大家最喜欢的小馆子叫“山明水秀”,位于学校前门的小街上,晚饭时分同学们常相约一起小酌几杯。聊天的话题宽泛而松散——从法律理论问题、实务争议,到对各类时事、琐事、各个老师的点评……包罗万象,无所不有。其间,挥斥方遒、平等争论者有之,语惊四座、拍案叫绝者有之,谈及妙处、相视莞尔者亦有之。

聪颖美丽的L君,无论读书、工作还是生活都堪称高手,早早就喜提“教练”雅号。D君说话声音不高,形体瘦弱,喜吃素,极重养生,形神均酷似“林总”,据说晚上9点必须准时拉上窗帘、熄灯就寝,房间里不能有光、风和电视声。大家一开始彼此客气,不予置评,熟悉之后,就常忍不住借酒盖脸、对他独特的生活方式揶揄几句:“像你这样子养生,就算活到一百岁,又有啥意思呢?”D君听罢总是好脾气地嘿嘿一笑,之后依然故我。T君是我们这帮同学中的大哥,为人方正严谨,思维睿智缜密,是典型的学霸,数门功课成绩均高居班级榜首。尤其令人钦佩的是,其酒品亦与人品、学品齐飞,虽酒量出众,酒风豪爽,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通常不对他人提啥苛刻要求,唯有对D君喝酒例外。估计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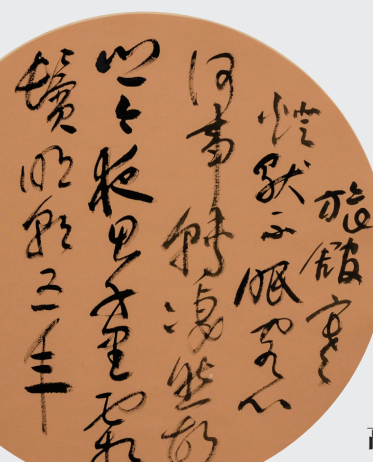
见D君对着美酒面有难色、唧唧歪歪的异状,T君早不爽久矣,遂在研一时就自担督导,令L君辅助“教练”,于晚饭时分顺便对D君实施专项培训计划,扬言毕业后夕要由我们5位同学任考官,对D君的培训成果进行专项答辩。奈何该生资质委实太差,就这么三天两头由金牌导师“二对一”顶级辅导,待到论文答辩时,也仅仅以两大杯啤酒的量勉强过关。

有着一张红扑扑圆脸蛋的Y君,热情豪爽,笑起来非常喜性可爱。他的酒量与T君有得一拼,席上只要有他,举座皆欢,常达“以一抵十”之效。毕业回常后,每逢同学相聚,Y君人未进门,就已先声夺人:“同学们,想死你们了!”……随后见到一张花儿般灿烂的笑容,大家的心情莫名地无比愉悦,仿佛整个场子都被他点燃了。久而久之,其他同学还未等Y君开口,纷纷争先恐后地抢上了台词:“Y君,想死你了!”……引来爆笑声一片。与Y君不同,H君喜欢跑步,不爱热闹,性格内敛而腼腆。记得以前每到相约晚餐时,总发现不见了H君。本着一个都不能少的原则,5个人锲而不舍,四处晃悠着找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每每总能在操场上“逮住”正在绕圈跑的H君。

集中授课期间的学习生活是规律而愉快的,可我常常不能安心享受。记得当时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拿着一支铅笔,长久地对课程表出神——不是思考与学习有关的事情,

而是琢磨着怎样才能“法定”的请假之外,再多抠出连续的一天或两天,用于处理手头各类不得不料理的琐事。为了达到这一“非法”目的,当年的我往往在一周内两次往返于家校之间,也常于点名不严的课上私自出逃,以期能两头兼顾,兼济天下。面对我堂而皇之的“摆烂”行为,T君忍了又忍,终致忍无可忍,有一次当众对我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你再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狭义的理解是通不过考试,拿不到学位证),必须悬崖勒马(不能再逃课!)”他的直言批评让我羞愧不已。说实话,如果换一个人,我可能会以插科打诨回应,要是觉着自己半斤八两的甚至还会反唇相讥。但T君不同。无论是对待学习还是工作,他都是一个高标准严要求的人,以他的自我标准为尺,再衡量他对周围人的要求,那应该已经算得上是非常宽松了,而我却连这样非常宽松的标准都没能达到……自此之后,痛定思痛,我的的确确是收敛了不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调整时间,安心上课。当然,偶尔也有混不过去的时候,过后总觉心下惴惴。时间一久,T君似乎也渐渐看出了我们做律师的种种无奈与狼狽,本已宽松的标准又一再放宽,不仅再未置过一词,谈笑间还多了几分无声的宽容与回护。

一晃毕业已快20年了,忽然会在某个时刻无比地感激T君——虽然从未当面表达过。多想在某个潇潇夜雨或者月朗星稀的晚上,和同学们一起再回到“山明水秀”啊,像从前那样天南海北,无话不谈……随着光阴的流逝,终会渐渐发现,过往的自己觉着刻不容缓、无比重要的事情,其实真的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而那些当年曾被自己无视的、忽略的,几乎想按快进键的时光,才是真正弥足珍贵的。(下)



高适诗一首 (草书) 张泽江